“阿穆尔”源于契丹语的“黑水”说

刘凤翥

有的文章说：“‘阿穆尔’也是达斡尔语，是达斡尔人对草鱼的一种称呼。”“由于黑龙江中草根鱼特别多，所以达斡尔人就把黑龙江称作‘阿穆尔’，其意是草鱼之江。”①这纯粹是一种附会之谈。

达斡尔语中管草根鱼叫amor②，其发音虽然与“阿穆尔”相近。但与阿穆尔河即黑龙江的命名却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达斡尔语中管黑龙江叫har muru③，其发音也与“阿穆尔”相近。har是“黑”的意思④，muru为“江”或“水”之意⑤，二者合起来为“黑水”或“黑江”之意。这是用达斡尔语意译的比达斡尔族还悠久的历史上的“黑水”。达斡尔语的这种译法是因袭的契丹语。

“黑水”之名早在隋唐时期即见史乘。例如《隋书》卷八一说靺鞨七部中有“黑水部”，《新唐书》卷二二〇说“他漏河，东北流入黑水”。达斡尔族是元朝之后才出现在历史上的民族，是由留居在当地的契丹及部聚合其他成分而成的民族。因而在达斡尔语中保存着许多契丹语。

契丹人崇“黑”，甚至国名都用“黑”作定语。例如契丹小字道宗哀册的册盖，根据对契丹小字的最新解读成果，应为“大中央哈喇契丹仁圣大孝文皇帝哀册文”之意⑥。“哈喇”即“黑”之意。西辽仍称哈喇契丹是表示对辽朝正统的继承。达斡尔语中表示“黑”意的har即来源于契丹语“哈喇”。

根据《契丹国志》卷首的《契丹国初兴本末》部分，契丹语管“江”、“河”叫“没里”。达斡尔语中的muru即来源于契丹语的“没里”。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阿穆尔”一词的渊源是：早在隋唐时期，我国既称黑龙江为“黑水”。辽代契丹人把“黑水”意译为契丹语，发音为“哈喇没里”。达斡尔语因袭契丹语，称黑龙江为har muru，仍为“黑水”之意。俄国人又把har muru音译为俄文的Амур一词。汉文又把Амур音译为“阿穆尔”。其音源于契丹语“哈喇没里”，其义源于汉文的“黑水”。

十六世纪末，沙皇俄国开始陆续向西伯利亚扩张。一五八〇年建秋明城，作为东进的根据地。其经营中心陆续东移，由秋明城迁至托波尔斯克，又迁至托姆斯克。至一六三二年，建雅库茨克，成为新的中心。俄国人建立了雅库茨克后才陆续得到关于黑龙江的最初报告，还都是一些间接的传闻。俄国人直接到达黑龙江流域，则是一六四二至一六四四年的波雅尔科夫东侵之时的事。在这期间，俄国人才从达斡尔族人民那里听到har muru即黑龙江的名字，于是就把它音译为俄文Амур。我国再把俄文Амур音译为汉文“阿穆尔”时，就使人感到有些晦涩，不知其来龙去脉了，竟至出现了误把黑龙江当作“草鱼之江”的这种鱼龙混杂的穿凿附会的解释，实有为之正名之必要！

注释：

① 《辽宁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第70页。
② 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达汉辞典词汇》，1977年油印本第14页。
③ 同②，第123页。
④ 同②，第122页。
⑤ 同②，第233页。
⑥ 拙文《契丹小字解读再探》，载《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

《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1期

释契丹语“迪邇免”和“乙林免”

刘凤翥

辽宁省朝阳出土的辽代《耿知新墓志》有“大横帐燕京留守、燕王、累赠陈国王乃外祖父也，封陈国迪邇免夫人，乃外祖母也”①之句。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阿鲁科尔沁旗出土的辽代《北大王墓志》有“［耶律万辛］又娶得萧胡睹马、皇朝公主孙，吴王、西南面都招讨、大王、何你乙林免之小女中哥；贞顺成风，言容作范，六年内加北大王，封为乙林免”。②朱子方同志说：“‘迪邇免’当为契丹语封号，语意不详”，③罗继祖同志也说：“迪邇免当是契丹语中的一种尊称，又作‘乙林免’，既不见《辽史》，也不见《辽史·国语解》，无疑问是《辽史》的漏略”。④本文试图对这一契丹语作一探索性的考释。

首先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迪邇免”或“乙林免”这个契丹语封号是用在女人身上的一种封号，并且现有资料表明，只有丈夫被封为“王”的女人才能得到这种封号。例如，耿知新的外祖母之所以能够“封陈国迪邇免”是由于耿知新的外祖父“累赠陈国王”。萧中哥的母亲何你之所以为“乙林免”是由于萧中哥的父亲为“吴王”和“大王”，萧中哥本人之所以能够“封为乙林免”，也是由于结婚后，她丈夫耶律万辛“六年内加北大王”。这都表明，女人们的“迪邇免”或“乙林免”的封号都同她们丈夫的“王”的封号相对应。

大量汉文汉语资料都表明，辽代封为“王”的人，其妻的封号可以为“妃”。例如辽重熙十五年（公元1046年）的《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志铭》说：“女二人：长适秦晋国王追谥孝贞皇太弟隆庆，册为秦国妃；次适故齐国王隆裕，册为齐国妃。”⑤也就是说，耶律隆庆由于封了“秦晋国王”，他的妻子才能封为“秦国妃”；耶律隆裕由于封为“齐国王”，他的妻子才能封为“齐国妃”。又如《晋国夫人墓志》说：“夫人族姓萧氏，父讳谐里，赠魏王，母齐国太妃。……女三人：长曰长沙郡妃，适同政事门下平章事长沙郡王。”⑥萧谐里由于“赠魏王”，他的妻子才被封为“齐国太妃”。萧谐里的大女儿之所以被封为“长沙郡妃”，是由于她丈夫是“长沙郡王”。这都说明，封为王的人，其妻的封号可以为“妃”。

除了“妃”之外，辽代封为王的人，其妻的封号也可为“夫人”。例如赵德钧“赠齐王”，其妻种氏“赠秦国夫人”⑦。张俭封陈王，其妻于氏封“齐国夫人”。⑧这都说明被封为“王”的人，其妻可封为“夫人”。

封为“王”的人，其妻的封号可以为“妃”或“夫人”；而“迪邇免”或“乙林免”的契丹语封号又与得此封号之人的丈夫封王相对应。“迪邇免”或“乙林免”的语意是否与“妃”或“夫人”有关呢？这还不能武断地下结论。还必须从语音上加以探索。

朱子方同志说：“迪邇免，《辽史·国语解》不载。”⑧罗继祖同志说：“既不

见《辽史》也不见《辽史·国语解》。”[1]果真如此吗？从表面现象看是如此，实质则不然。

《辽史·国语解》在解释“阿点夷离的”这句契丹语时说：“阿点，贵称。夷离的，大臣夫人之称。”[2]“夷离的”与“迺遍免”和“乙林免”词干相同，词尾有异。

契丹语属于阿尔泰语系，其语法特点是在词干后面粘着不同的词尾来表现不同的语法关系。不同的词尾仅仅表明该词在语法上的不同作用，并不影响其本义。例如契丹小中的“岁次”直译为“年（之）次”，把“年”字加一个所有格词尾即为“岁”。当谈到某人于某年干什么时，往往在这个“年”字之下加上一个时位格词尾，意思是说“到了某年”或“在某年”。“年”字加上所有格词尾也好，加上时位格也好，其“年”的本意不变。“夷离的”和“迺遍免”或“乙林免”也应属于这种情况。因此我推测“迺遍免”或“乙林免”的语意应与它同词干的“夷离的”相同，即“大臣夫人之称”。

或许有人设问，《耿知新墓志》说耿知新的外祖母“封陈国迺遍免夫人”，既然“遍迺免”的语意为“夫人”，在“迺遍免”之后再加“夫人”二字岂不多余？

按着汉语翻译习惯，不仅不多余，而且恰恰符合汉语的翻译习惯。汉语在翻译少数民族或外国语言时，往往采取音译与意译相结合的办法，即在音译之后再加一个解释性的字。例如“老罕王”、“沙皇”、“吉普车”、“摩托车”、“坦克车”，等等，都是这种情况。以“沙皇”为例再说明一下，俄文中的“皇帝”，采用“沙”的音译之后，又惟恐读者不懂，因而在“沙”字之后又加了一个解释性的“皇”。“迺遍免夫人”的情况恰与此相似，说明“夫人”是解释“迺遍免”的，这就进一步证明了“迺遍免”于意为“夫人”的正确性。

这种音译与意译相结合的译法多半是在初译时采取的，为了便于读者看得懂。时间久了，大家都懂了，也可把解释性的字去掉。例如“坦克车”和“摩托车”中的“车”就可以去掉。也有永远不去掉的，例如“沙皇”一词。《耿知新墓志》是出土于朝阳的太平七年（即公元１０２７年）的汉人墓志，当时当地的汉人可能还不习惯于契丹语，或者说当时当地的大多数汉人还不习惯于“迺遍免”这个契语，因而加了解释性的“夫人”二字，否则就不易懂。《北大王墓志》[2]是出土于阿鲁科尔沁旗昆都公社乌苏伊台生产大队温都地方的重熙十年（公元１０４１年）的契丹人墓志。当地至今仍为少数民族地区。从时间上它比《耿知新墓志》晚了十年，从地点上更靠近契丹人政治中心辽上京。从墓主人上是契丹人，因而无论从哪一方面讲，当时当地的契丹人都懂得“乙林免”为何意。所以就没有再加解释性的“夫人”二字，直接两次用了“乙林免”。

总之，我认为“迺遍免”或“乙林免”是丹契语封号，丈夫封为王的女人可以得到这种封号，其语意为“夫人”之意，也可能为“妃”之意，《辽史·国语解》中的“夷离的”是与这个词同词干的词。《沈阳师院学报》1980年1期

注

①《耿知新墓志》，载《辽宁第一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3期。

②《北大王墓志》尚未发表，引文据阿旗文化馆马俊山同志所赠拓本。

下转724页

契丹考古对中国通史研究的贡献

陈　述

一、契丹考古材料是对辽史记载直接的补充和订正

考古出土材料是多种多样的。对文献记载，也在多方面起积极参证作用。首先是出土的文字材料，如墓志铭之类，它直接补充订正历史记载。《贾师训墓志》记载了辽在宋辽边界地带设有特务机关。这在《辽史》里没有记载。《张世卿墓志》记载了辽代晚期的纳粟补官的事实，纳粟补官就是用钱捐官，《辽史》有记载，在《道宗纪》的大安二年四月里有“立入粟补官法”六个字，很简单。有了这个《墓志》就证实了《辽史》，同时也更丰富了《辽史》。这都是很明显的。去年项春松、吴殿珍两同志在《考古》（82年3期）发表了《邓中举墓志》（邓是医药世家）是对这类资料公布发表的一个范例。对《墓志》作个简短介绍，把全文照相登出来，供大家看，这是考古工作者的光荣贡献。当然，同时作一些考释也好。不能说，一定等着彻底研究好了再公布。几时没有研究出来，就先暂时存着，这样很容易散失。

文字材料除了直接补正史书，还可以帮助判断墓内器物的时代，比如墓内有“某年某月日掩闭”虽然只是几个字，却直接解决了许多问题。间接还可以用此墓器物型制比关其他没有年月的墓葬中的器物。对器物断代、对墓制和其他相关方面都会提供比较、起积极作用。没有直接记墓葬的文字，但出土有辽钱、北宋钱，根据钱币年号也提供了参考的线索，这是关于文字材料的。

其次是器物、金属（金、银、铜、铁）陶瓷、竹木等器物。这是出土材料里较多的一部分，通过出土器物可以了解使用和当时的生产、生活以及铸造制作工艺等情况，这些都是在坐诸同志最熟悉的了。

这里有一点要强调，考古材料的发掘、研究等环节，都需要文字材料的指引、帮助判断和说明。

再有壁画、洞窟造像、墓室构造葬俗等等，在展览室陈列的有关葬俗部分，很好。使我们增加很多知识。壁画，在墓葬中的多数是反映墓主生平；在寺院墙壁的多数属佛教故事。这差不多是一个规律，完全属于画着好看的、作点缀的是极少数的。当然，随葬的挂轴那又当别论。

考古材料，以实例填补文化史上的空白，这在辽代特别显著，如墓葬里出土的牙刷，说明当时对口腔卫生的知识；医学口腔研究所周大成教授专程找我研究过这件事。双陆、围棋子、象棋子表明当时的游戏、文娱生活，也作赌博活动，辽金文献里，记载文化史迹的比较少。辽更少，出土实物最说明问题。

契丹文字近年研究有成绩，当然，这主要是因发掘出土的新材料带动的。没有庆陵哀册出土，学术界还不知道契丹字是什么样子，一直把《郎君行记》当女真字。《哀册》发表以后，大家就拿着《哀册》相面，进而用汉文哀册比较，用干支年月对算，这样认识了一些字。还不能读音，也不知是大字

马邓〔muri〕中的ㅈ为〔mu〕，犬倒〔nəxəi〕中的伏为〔nə〕，鸡鸳〔taxi'a〕中的令为〔ta〕等等。

（3）同一音位常常用不同符号表示，例如：只、汉、ㅈ、及均为〔u〕，ㅅ、丙均为〔i〕，公、令、久均为〔t〕，伏、公均为〔n〕，ㅈ、ㅈ均可作〔tʃ〕等等。

突厥文字母还有一个特点，即表示b、d、y、l、n、r、s、t八个辅音的字母各有两个，一个叫做硬辅音，只能和后元音相拼；一个叫做软辅音，只能和前元音相拼。这个特点在契丹小字中不明显，但似乎也能发现点蛛丝马迹，例如：契丹小字中的ㅈ〔ta〕、角〔tə'a〕、门〔tu〕、非〔po〕、本〔la〕等似乎带有硬辅音的影子，而夫〔ri〕、化〔ri〕、圭〔ti〕、ㅈ〔li〕等则是另一类。

总之，初步研究表明，在契丹小字中确实可找到和突厥文的相似之处，所以说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契丹小字本身来看，都不能说迭剌制作契丹小字时参考过突厥文是绝无可能的。但是，制作契丹小字时，在字形上主要是借鉴了汉字，这可以肯定；在拼音方法上可能同时也受到了汉字反切原理的影响。这些和认为“参考过突厥文”并不是互相排斥的。

注：①参见《五代会要》卷二九，《新五代史》卷七二，（元）陶宗仪：《书史会要》卷八。 ②见契丹文字研究小组：《关于契丹小字研究》，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77年第4期第3页。 ③《辽史》卷六四《皇子表》，中华书局版第968页。 ④见村山七郎：《契丹字解读の方法》，《言語研究》，1951年，17—18號。 ⑤参见耿世民：《古代维吾尔族文字和文献概述》，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3期；胡振华：《维吾尔族的文字》，载《民族语文》1972年第2期。 ⑥k^1、t^2等表示这些辅音字母只和后元音相拼，n^2等表示只和前元音相拼。 ⑦其中化音〔t〕，以及下文提到的本音〔la〕，均另文详述理由；夫音〔ri〕，见拙文：《契丹原字“夫”音值考》，载《东北考古与历史》丛刊第一辑（待印刷）；本文所引其余原字音值均依《关于契丹小字研究》。 ⑧、⑨耿世民：前引书。

(上接745)

③⑧朱子方：《辽代耿氏三墓志考释》，载《辽宁第一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第3期。

④⑩罗继祖：《读“辽代耿氏三墓志考释”》，载《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1、2期合刊号。

⑤《秦晋国大长公主墓志铭》，载《考古》1962年第8期。

⑥《晋国夫人墓志》尚未发表，引文转引自阎万章同志《辽道宗仁懿皇后父为萧孝忠考》，载《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第2期。

⑦《赵德钧暨妻种氏墓志》，载《考古》1962年第5期。

⑧《张俭墓志》尚未发表，引文据北京博物馆筹备处所存拓本。

⑪《辽史》卷百十六国语解。见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1535页。

《沈阳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
1980年1期

契丹小字字源举隅

即 实

辽陵契丹小字帝后哀册的出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研究契丹文字的兴趣。六十年来，克服重重困难，走过曲折道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国内的研究，已经分清了大字小字。大字的研究，虽仍处于推断文义的阶段，小字的研究，则已进到辨识读音的阶段。《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7年第4期《关于契丹小字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一文，就是这一阶段的代表，它的成就是一次突破性的进展。它使我国的契丹文字研究，取得了应有的地位。国外的研究，早已进入辨识读音的阶段，但是正确率似嫌偏低。《研究》一文从释读汉语借词入手，拟定百余原字的读音，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笔者则从字源与契丹词语方面作了初步研究，也有些微收获。

根据《书史会要》的记载和国内外学者近年的对比研究可以知道契丹文字原以汉字为本所制。既然以汉字为本，则其读音或意义必与所本之汉字有一定联系。如果这个推断不错，那么，寻出各个契丹字迹，对于推断文义或拟定读音当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例如契丹大字“皇帝”二字是移植的汉字，其读音与意义，当与汉字相同。“五月”二字也是移植，意义当与汉字相同，读音当是契丹语之〔tawu ser〕。“㬎”字当是名词与时位格助词之缀写，上半是日字原形，其义为时间单位之日，读音当是〔ədur〕；下半是时位格助词，其义为于，读音当是〔də〕或〔tə〕，正与“得”字音近。合之，其义为“于某日”。又如契丹小字圭字字源是㞢，读音相同。介字字源是𠂤，读音相近。

由此可见，探求字源很有意义。当然，寻索字源也不容易。本文就个人探索小字字源的一得之见，提出粗浅的看法，以求教于同行和读者。

先说表意字

契丹文字依据汉字制成。汉字表意的特点，给它留下烙印，是比较自然的事。所以，小字之中也有一些表意文字。

先讨论表意字又。

又与㕣，字形相近。㕣读轨，又若来自㕣，读音亦当相去不远。

又之文义为大，似乎无大争论。辽的年号大安、大康之大，均用此字，即是证明。但因寿昌亦用此字，便将此字解为古汉语助词之惟[1]。愚意以为非是。又义为大，则㐆㐅之义为寿。寿之大者，可谓寿昌。这大约是为了使译文合乎汉语的习惯。又与㐆㐅正是寿昌一语不可分离之组成部分，若加分割恐怕难于成语表义。

这就象奀字本来是天德、乾统的组成部分，但因清宁、重熙也用此字，便觉“天”义难在其中立足，以为奀是附加之词，而把㚔㐅当作清宁、把㐆分㐅㐅当作重熙一样[2]。其实，前者之义为宁，并无清义（详见北字解）；后者之义为熙，并无重义。奀义原为广大（参见拙文